

□ 议政·参考

- 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健康问题尤其凸显。
- 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在疫情期间具有更高的网络和手机成瘾的比例,情况堪忧。
- 多措并举,加快促进建立多重困境儿童救助保护长效机制和积极发展促进体系。

# 让困境儿童真正走出“困境”

□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课题组

编者按: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爱护和发展工作。2015年颁布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201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以及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均明确指出要完善关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提供关爱保护服务,加强对这一类儿童群体的心理辅导。

2019年12月到2020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林丹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及积极发展体系研究”课题组以方便取样的方式,抽取了某省经济欠发达县乡地区9~16岁的农村儿童共882人。其中困境儿童(即有虐待史、曾遭受同伴侵害、父母离异或高冲突、经历重大生活挫折如近亲离世的儿童)220人,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即不满16周岁时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与父母联系很少、与抚养者关系差及遭遇以上早期逆境的留守儿童)共188人,普通农村低风险儿童474人。通过问卷、个别访谈等方式,深入了解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及发生后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以及拥有的家庭、学校、社区环境等资源。

2022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特将调研组所发现的农村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对策建议编发,期待为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献计助力。



本报记者 贾宇 摄

## 问题与发现:农村困境儿童亟须重点关照

课题组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大部分农村儿童造成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疫情防控期间承受较高的与疫情相关的压力,学习效率降低;抑郁、焦虑、孤独感等消极情绪比较常见,自伤行为等问题较为突出;手机成瘾的比例大幅增加。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健康问题尤其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因疫情影响,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遭遇较大困难,承受了较高的与疫情相关的诸多压力。**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危及感染者的身体健康,同时给人们带来多方面的压力,具体表现在:长期过多地接收与疫情相关信息会导致焦虑和恐慌,封锁限制、保持社交距离使社交互动缺失,疫情防控使工作和学习迟迟无法步入正轨等等。过半农村儿童普遍承受很高的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相关的压力(如经常在疫情防控期间听到或看到别人讨论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和传染性)。农村困境儿童,尤其是有家庭忽视与虐待史的儿童,有21.1%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较大程度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率,25.2%认为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

**第二,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存在比较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此次疫情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困扰;经历困境越严重的农村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越突出。**课题组对比疫情前后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存在生活满意度降低、消极情绪升高和自伤行为

增加等问题。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这两类儿童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满意度(<36%)显著地低于农村低风险儿童(58.9%),而他们的消极情绪,包括抑郁(>24%)、焦虑(>31%)、同伴孤独感(>17%)和消极情感(>41%),显著地高于普通农村儿童。另外,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中高自伤行为的比例(>6.4%)显著地高于农村低风险儿童(1.9%)。这一结果说明,与农村低风险儿童相比,困境儿童与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

**第三,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同样需要关注,尤其是经历多重困境的留守儿童。**近年来,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成为网络和手机成瘾的高发人群,严重影响他们身心健康。课题组调查中发现,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儿童手机成瘾的比例均有所增长。其中,疫情前多重困境留守儿童中手机成瘾的比例有42.7%,这一比例在疫情防控期间达到50.2%。而农村困境儿童在疫情居家学习期间,手机成瘾的比例达到47.7%,比疫情前增加了14%。此外,疫情期间,多重困境留守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也显著地高于其他农村儿童。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在周末使用电子产品6小时或更多的比例达到37.4%,远高于农村困境儿童(25.9%)和低风险儿童(22.7%)。综合来看,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在疫情防控期间具有更高的网络和手机成瘾比例的情况令人担忧。

## 思考与建议:多措并举,建立救助保护长效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2020年3月印发的《因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进一步落实了对这一类儿童群体的救助保护工作。但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疫情的影响或将长期、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农村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仍面临多重挑战,建立专业、有效、多层面的救助、关爱保护和促进积极发展的长效机制尤为关键。

**建立健全救助和关爱保护体系,及时发现并报告高危、多重困境儿童及家庭,制定差异化关爱保护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员流动管控和隔离等措施,给农村困境儿童家庭,尤其是防护能力较弱、防护物资比较匮乏的家庭,带来极严峻的挑战。课题组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农村家庭在疫情防控期间无法获得足够防护用品的比例达到42.1%;50.9%的受访者父母认为此次疫情打乱了他们原有的工作计划;43.6%的农村家庭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就业困难或家庭经济困难。对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家庭的走访排查力度,及时发现报告高危多重困境儿童及家庭,掌握他们的生活保障、疫情防控等基本情况,并制定差异化的关爱保护政策。

特别要重点关注以下三类家庭:一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其主要照料者因年迈不能承担监护责任的留守儿童家庭,监护缺失是其主要问题。对这一类留守儿童家庭要突出落实临时监护的举措,除了要建立社区监测追踪体系,还要督促委托其他具有监护能力的人代为照料,对确有困难

的家庭,有关部门应承担临时监护和照料保护责任。二是因受疫情影响,父母外出务工受阻、家庭收入骤减的家庭,其经济来源不稳定、应对风险能力较弱,对这一类农村儿童家庭,有关部门要做到早发现、早救助,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保障基本生活物资和防护用具的供给。此外,各地应相应出台政策,引导扶持这一类困境家庭返乡创业就业等,切实为这一类农村困境儿童家庭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和政策支持。三是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特别困难儿童家庭,相关部门应扩大救助面,提供一次或多次临时生活补贴,给予全额免费治疗救助,切实兜住农村高危多重困境儿童家庭的安全、健康底线。

**从个体认知—父母教养—社会支持等多维度提升农村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及家庭的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是指“面对逆境、灾难和创伤时的应对能力和适应过程”。以往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尽管在生活上遭受了相当的逆境和挫折,但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独立生活能力,对待生活比较乐观,拥有较高水平的心理弹性,部分困境儿童、留守儿童能够积极地将“逆境”转化为“机遇”,获得成长进步的动力。课题组调研发现,拥有高心理弹性水平的农村儿童,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心理弹性较低的儿童;同时,他们的消极情绪,包括抑郁、焦虑、同伴孤独感和消极情感均要低于心理弹性较低的儿童。培养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个体心理弹性及家庭弹性,充分发挥他们积极的个人特质和积极家

庭功能的重要作用,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时尤为关键。

应从个体认知—父母教养—社会支持等多维度,充分发挥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个体积极特质,提升其应对疫情等外部压力的心理承受力。一是在个体层面,可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心理弹性干预,例如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有助于儿童应对逆境的“心理弹性干预”项目或国际流行的正念干预疗法等。正念疗法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和缓解困境儿童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发正念压力缓解和心理弹性干预课程,定期组织乡村教师、社区工作者进行正念干预和心理弹性培训,运用课内课外活动,提升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在压力情景中的自我效能感和对注意力的控制,促进他们使用认知重评等有效的方法对“逆境”进行再定义,对儿童在疫情防控期间遇到的心理问题和其他挑战进行有效的情绪调节。二是在家庭层面,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父母及主要照料者应营造支持、有爱的家庭氛围,并提供足够多的机会让儿童学会应对生活挫折。此外,通过“互联网+”或新媒体等新技术,给农村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父母提供家庭教育相关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并帮助他们构建家庭共同信念体系,提升家庭成员间相互支持和联结力、家庭沟通和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建立起家庭层面的心理弹性。三是社会支持层面,可以通过社会情绪训练提升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和社交能力,帮助他们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抵挡此次疫情给他们带来的冲击。

**补齐农村教育短板,优化农村学校信息化设备和网络环境,为农村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赋能**

切实解决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因疫情所遭受的教育方面的挑战极为重要。鉴于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长期存在,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作用对教育赋能,将更多更优质的资源带到农村儿童,尤其是农村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身边已迫在眉睫。但当前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和教育过程中仍存在以下的问题和挑战:部分乡村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较差未达不到网络授课的要求,农村儿童对网络授课和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适应性较差,学习效率不高、部分农村教师在线教育教学的能力不足以及农村家长/主要照料者信息化素养整体不高等。

针对这些问题,应大力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一是优化农村学校的信息化设备和网络环境,对特别贫困的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家庭,各地区部门应摸底排查,及时解决这一类儿童群体利用网络进行学习的问题,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有效的网络设备进行网络学习。二是整合优质的网络教育资源,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儿童青少年群体,设定不同计划,提供内容多样的网络课程,并创建适合学生在线学习的情景,增加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三是提高教师信息素养,向乡村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在线培训,例如,如何运用在线教学平台开展个性化教学,以及设置有效的在线教学活动提高学生参与、加强师生互动等。同时,提供多方位的教师教育在线培训,包括如何在疫情防控期间向学生提供心理关怀、如何向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四是实施家校合作,利用微信平台搭建

家庭教育指导的公共平台,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的方式实现学校教师与家长双向互动,促进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家长更多参与孩子的网络教育。五是健全网络教育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教育、网信等多部门要协同合作,适当提高网络教育的准入标准,规范相关从业人员的行为,确保网络教育健康有序发展,为农村儿童提供优质、有效以及安全的网络教育资源。

**多措并举,建立多重困境儿童救助保护长效机制和积极发展促进体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多重困境儿童,尤其是遭遇早期逆境、被虐待、曾遭受同伴侵害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心理压力的消极影响。应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多重困境儿童心理干预的有效国际经验,多措并举,加快促进建立多重困境儿童救助保护长效机制和积极发展促进体系。

**第一,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强对农村多重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在后疫情时代的救助保护工作。**应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利用以往构建的农村困境儿童关爱大数据平台,对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多重困境儿童的需求进行精准定位、精准分析、精准匹配社会公益资源,实现线上线下数据共享,利用AI和云计算提供的农村多重困境儿童的群体特征和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有关部门间的协调联动,进行精准决策,推进精准关爱保护工作。鉴于此次疫情将会长期、持续地影响农村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应建立一套相对规范化、长效化、数字化的救助保护机制,为后疫情时代的农村困境儿童提供及时、精准的基本生活保障、学习辅导、教育帮扶、志愿陪伴、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多层面的关爱保护工作。

**第二,加强多重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专业队伍的建设。**一是需要多学科协同合作,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和公共卫生学等,共同帮扶多重困境儿童应对在疫情防控期间遭遇的困难和挑战。二是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应协同医疗卫生机构、心理咨询人员、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相关公益慈善组织,加大对多重困境儿童群体的走访摸排力度,及时发现、报告高危多重困境儿童,完善快速应急响应机制。三是要对多重困境儿童救助保护队伍进行专业培训,尤其是对遭受家庭暴力、虐待等高危儿童群体落实强制报告责任,进行必要的预防干预,并提供相应的心理疏导、精神关爱、亲情陪伴等服务。

**第三,提高家庭—学校—社区积极互动和紧密合作,构建多层面的农村多重困境儿童积极发展促进体系。**家庭层面,父母应利用当前因疫情原因有较多时间与儿童相伴的机会,进行有效的亲子交流和沟通,通过陪伴时间和陪伴质量的双提升,充分发挥家庭对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应对疫情带来的压力所起的重要保护作用。学校层面,应建立家校合作新模式,加强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鼓励家长参与疫情防控期间的网络教育和心理弹性干预等活动,共同培养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在疫情相关逆境下的心理弹性。社区层面,应加强社区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建设,加大农村困境儿童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针对疫情对农村困境儿童带来的心理、教育方面的影响,提供丰富的心理疏导和教育资源,营造积极的社区氛围,提升农村困境儿童的社区归属感。集家庭—学校—社区于一体的多层面积极发展促进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好农村困境儿童、多重困境留守儿童在后疫情时代的生活和各项权益并促进积极发展。

(课题组成员:林丹华、谢明璐、孙佳宁、刘文、赵国祥)

**教育在线:**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教授,您长期关注弱勢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当下,春节结束,很多父母又返回打工的城市,又出现了很多留守儿童。而留守儿童中还有部分孩子,父/母因服刑或其他等原因而导致家庭陷入困境……对于这种群体的孩子,在心理成长上有什么问题和表现?

**林丹华:**这个群体的孩子可以称之为“困境儿童”。困境儿童是指由于儿童自身和家庭原因而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的未满18周岁的儿童。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国家出台的一项针对困境儿童的兜底保障政策。《意见》中称: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应该得到父母陪伴的成长时期,由于父母的缺失,而导致童年时期缺失足够的安全依恋,孤独焦虑,得不到足够的爱,这将为其一生的幸福打下糟糕的烙印。因为长期的缺乏爱,会导致他们的内心不会关爱别人,并出现一系列孤独、焦虑、抑郁等情绪。

比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因家庭监护缺失而导致的孩子。比如被拐卖妇女所生的孩子,在父亲被判刑、母亲被解救走后,他们便成为困境儿童。除了从小缺乏父母的爱之外,他们内心还带着强烈的与生俱来的“罪疚感”——很多孩子会认为:他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妈妈被拐走、爸爸犯罪的原因都是自己的错。再加上周围指点嘲讽的生长环境,让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内心会埋下罪疚感的种子。而这种罪疚感是成长中的“毒瘤”,因为从小在故意、嘲讽、疏离关系环境中长大,有的孩子会完全没有自我,性格极度懦弱、自卑、退缩;有的人会带有故意的攻击性的人格。尤其在更为敏感、逆反的青春阶段,这个问题会表现得更加严重。所以,他们的心理问题迫切需要得到关注,如果潜藏在心理的问题不及时疏导解决,他们长大后进入社会后,会用小时候所看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罪恶”就会一代代传下去,这是很可怜、很可怕的事情。

**教育在线:**对于困境儿童,除了在物质上给予关爱之外,我们的社会如何在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给予帮助?

**林丹华:**2019年12月到2020年6月,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及积极发展体系研究”课题组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做了调研;前不久,基于对留守儿童和我国农村社会心理扶贫现状的调研,我又深入走访了不少乡村。经过和乡村振兴局,以及贫困县基层的教育局、卫健委、民政局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并在基层挂职的扶贫干部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了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即很多政策的执行在最基层的乡村大打折扣、很难落地。我深切地感觉到:当下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物质上已经实现了扶贫,但心理及精神层面的扶贫,尚需久久为功。

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都是在专家充分调研基础上诞生的,一定要将其精神扎根到最基层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但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仅仅停留在宣教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国家政策要求在农村基层或村(社区)建立心理咨询(辅导)室,但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要么没有,要么也就只是有物理层面的屋子,没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落地;今年正式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可以采取建立家长学校等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并及时联系、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加。”但是很多学校的家长学校形同虚设。所以,我特别呼吁针对困境儿童,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可具体执行落地的关爱机制。

困境儿童需要得到稳定的、可持续的、对身心成长有益的救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这就迫切需要在广大农村地区及社区基层建立一支永不撤退的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心理关怀工作队伍。

**教育在线:**“永不撤退”,意味着要组建本土化的专业资源力量?

**林丹华:**面对困境儿童群体,很多部门都有相关的帮扶责任和义务,但调研中我们发现,责任一旦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系统时,操作起来便没有具体的抓手,导致很难落地。

所以,我们建议要结合具体的案例,民政局、村委会等几个相关部门一起认真分析研讨,在法律精神要求的框架之下,对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可落地的举措。我认为对于广大乡村而言,不一定最权威的心理专家就是最适用的。相反,那些村医、社区工作者、扶贫干部、在职或退休的乡村教师,甚至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等,他们生活在乡村,了解乡村文化,经过相应的心理专业能力的培训后,应该成为让乡村心理扶贫工作落地的主力军。

其实,不光农村,在城市里也有困境儿童,比如那些被家暴、被虐待的孩子群体等。虽然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因性别、身体状况、智力等歧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但只有建立了家门口够得着的工作机制,法律的阳光才能普照到每个孩子身上,让所有未成年人的成长得到保障。

2022年全国两会将至,我期待更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能为困境儿童群体而呼吁,期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让困境儿童的保护更精准、能落地。



本报记者 贾宇 摄

## 困境儿童的保护如何更精准

本报记者 张惠娟